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为何要做到“五不”

城市工作规律性认识 上升到新的高度

朱启贵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初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强调“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求“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一“五不”论述立足中国金融实际,融合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划定坐标、明确准则。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筑牢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基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是金融活动的生命线。金融业的一切交易活动、合作关系都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从资金融通到风险定价,从市场交易到行业监管,失去诚信的金融市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逾越底线的失信行为则会直接破坏金融生态、引发市场动荡。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金融领域的传承与彰显。中华五千年文明,重信守诺是核心道德规范。“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知其可也”的理念深入人心,也孕育了中国传统金融业态的诚信基因。近代山西票号能纵横全国金融市场百年,核心就在于坚守诚信底线。日昇昌票号为数十年的旧汇票如数兑付,恒和银号歇业后仍租屋兑现银票成为传统金融文化的典范演绎。诚实守信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优良传统。1935年红军撤离遵义时连夜收回红军票保障群众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收兑苏区逾期公债并兑付利息,用实际行动诠释取信于民的金融初心。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维护金融秩序、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依赖于市场主体的诚信自律。只有金融机构如实披露信息、不恶意诱导消费者,金融交易者恪守契约、不搞虚假操作,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反之,逾越诚信底线的失信行为,如虚假宣传、违规操作、逃废债务等,不仅会直接损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更会破坏市场信用体系,引发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加强金融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出台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将涉金融严重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并对银行保险机构的失信

行为开展严厉惩处,通过制度约束进一步筑牢诚信底线。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坚守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区别于西方金融文化的重要特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理念,又结合现代金融发展实际,明确中国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商业文化历来反对“唯利是图”,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为“义”是“利”的前提和约束。只有符合道义、顺应民心的利益追求,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义利观融入金融领域,便形成了“金融为民”的价值内核。金融的“义”,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上,体现在助力国家发展战略的使命担当上,体现在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上;金融的“利”,是金融机构坚守“义”的前提下,通过合规经营、优质服务获得的合理利润,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摒弃“唯利是图”的片面追求,才能让金融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同频共振。这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鲜明特质。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明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方向

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既明确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也厘清金融创新与金融本源的辩证关系——守正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无论守正还是创新,都必须牢牢扎根于实体经济,坚决防止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首在“守正”,这是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守正”就是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守金融风险防控的底线思维,坚守金融为民的价值理念。这是金融发展的“根”和“魂”,也是金融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脱离“正”的指引,金融创新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投机套利的工具。部分机构打着“金融创新”旗号,推出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本质上就是“伪创新”,最终只会积累风险。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遵循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发展逻辑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具有杠杆性、关联性、传导性强的特点。一个环节的风险失控就可能引发整个系统、区域性金融风险,甚至冲击经济社会大局。“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精准把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特征,明确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是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管理

风险,稳健审慎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稳健经营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持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内部控制有效,不贪图短期暴利、不超越自身承受能力过度冒险,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抵御风险、行稳致远。如果急功近利,盲目扩张规模,开发高风险金融产品、发放不合规贷款,必然会导致风险积累,最终引发经营危机。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筑牢金融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和根本任务。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强大的金融机构、完善的金融市场与有效的金融监管,稳健审慎的金融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将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提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的要求通过“长牙带刺”的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摒弃短期化、功利化的发展倾向,注重长期价值创造。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明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方向

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既明确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也厘清金融创新与金融本源的辩证关系——守正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无论守正还是创新,都必须牢牢扎根于实体经济,坚决防止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首在“守正”,这是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守正”就是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守金融风险防控的底线思维,坚守金融为民的价值理念。这是金融发展的“根”和“魂”,也是金融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脱离“正”的指引,金融创新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投机套利的工具。部分机构打着“金融创新”旗号,推出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本质上就是“伪创新”,最终只会积累风险。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遵循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发展逻辑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具有杠杆性、关联性、传导性强的特点。一个环节的风险失控就可能引发整个系统、区域性金融风险,甚至冲击经济社会大局。“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精准把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特征,明确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

等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捷性,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严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法治准则

法治是金融发展的坚强保障,合规是金融经营的基本前提。金融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国计民生,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运行。“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彰显法治金融、规则金融的理念,为金融运行划定法治轨道,为金融监管提供根本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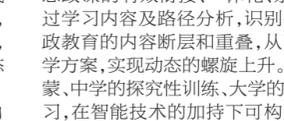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金融市场是规则市场,依法合规是金融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依法合规,强调的是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市场参与者都要尊崇法治、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胡作非为,强调的是严禁突破法律底线、违反监管规则、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依法合规是金融安全的“防火墙”,不胡作非为是金融机构的“护身符”。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如非法金融活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洗钱诈骗等,不仅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群众利益,还会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相关典型案例充分证明:失去法治约束,金融就会陷入混乱;缺乏合规意识,机构就会走向覆灭。西方金融市场因监管缺失、合规松弛导致的危机,也深刻印证了依法合规的重要性。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是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在于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构建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一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健全金融监管规则,填补监管空白,消除监管盲区,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二是强化金融机构合规管理,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理念,健全内控合规机制,让合规成为自觉行动;三是加强金融监管执法,坚持严字当头,维护市场公平正义;四是提升金融从业人员法治素养,增强规则意识、底线意识,坚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总之,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唯有始终坚守“五不”要求,让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成为金融发展的精神内核和软实力支撑,才能推动金融事业行稳致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邓智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城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为我们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提供了科学指引。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基于市场自发逻辑与先发优势,主导了全球学术话语。这一源于西方特定制度与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轨迹、文化底蘊与制度安排下的城市化进程时,往往显得解释力不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构建植根中国实践、兼具学术主体性与理论解释力的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新范式、推动人类城市知识革命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以制度优势、超大规模与文明根脉为独特基础。先看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努力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突破西方“弱政府一强市场”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西方“资本优先”的逻辑形成鲜明区别,保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战略性供给,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协同。

再看超大规模的城市体系。中国用40余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建成了由22座超大特大城市引领、众多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巨型城市网络,城市常住人口与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迈上新台阶,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标志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无所不见。这种超高速、超大体量的城市化,既带来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配置空前复杂的挑战,也催生都市圈同城化、城市内涵式提升与治理模式创新的丰富实践,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样本与问题场域。

接着看深厚文明的持续滋养。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天人合一”生态观、“民惟邦本”治理伦理以及“兼容并蓄”发展智慧构成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中国城市的空间伦理、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与西方城市化中常见的资本扩张逻辑不同,中国的城市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历史文脉传承与社会网络维系,内嵌浓厚的共同体意识与人文关怀。这种将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系统性融入发展逻辑的实践,超越西方将文化视为次要变量的理论视野,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的文明根脉。

另一方面,以“人民性发展”为目标、以“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为机制的概念性框架。

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理论植根于“强市场”假设,倾向于将政府角色简化为外生的“守夜人”或矫正“市场失灵”的被动干预者,其分析核心聚焦于市场自发的要素配置与空间均衡过程。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及其他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践时,常呈现解释力不足与水土不服的困境,并难以内生地处理一个战略性、引导性且深度介入发展

的政府角色。

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全面确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实践、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统摄性核心目标,以“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为两大基础性、协同性作用机制,系统阐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实践语境下的辩证统一与协同共生。

“人民性发展”确立价值灵魂与元目标。它深刻批判以资本利润最大化和空间扩张为核心的物本发展观,将发展的终极标准锚定于人民群众在教育、健康、就业、居住、环境及社会参与等维度的“可行能力”的全面提升。它并非附着于经济过程之外的伦理装饰,而是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经济活动的价值边界与归宿。一切经济增长、空间集聚与区域调整,其正当性与成效最终都需接受“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标准的检验。在“人民性发展”目标引领下,“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协同作用,分别回应“如何实现高效发展”与“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的核心问题。

“制度性集聚”机制聚焦于发展动力与效率提升。政府并非替代市场进行要素配置,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国土空间规划、科技创新激励与营商环境系统优化等制度工具,积极塑造和引导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更富创新潜能的领域与空间节点集聚。这一机制内嵌人民性要求:制度设计旨在使集聚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地转化为民众生活质量的同步提升,从而在源头上规避“只见城市扩张,不见民生改善”的扭曲发展,防范因纯粹市场集聚可能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空间分异。

“政治性均衡”机制聚焦于发展格局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通过构建一套“市场初次配置与政府二次调节”相结合的双重均衡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初次配置效率优势的基础上,要求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组织对口支援等政治经济手段,对市场形成的空间格局进行有意识的、战略性的矫正与再平衡,其目的并非追求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范围内,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享有基本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公共福利。

进一步看,“人民性发展”目标与“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目标统领一基础机制”的有机整体。其中,“人民性发展”是价值锚点,为两大基础机制注入灵魂、划定边界;“制度性集聚”侧重激发活力、提升效率,“政治性均衡”侧重调节秩序、保障公平,二者在动态平衡中相互支撑、协同促进,共同实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共建共享中激发增长动能”的闭环逻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政宁

在推进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下,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可以为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水平赋予新动能。这不仅是技术应用的简单叠加,更是教育底层逻辑的重构、教育理念的升华、教育模式的变革。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刻不容缓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要求超越传统课堂的边界,构建课内与课外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未来对话的育人新格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系统性困境,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矛盾:

一是粗与精的矛盾,思政课教学存在“粗放型”教学供给与“精准性”学生需求的矛盾。

研究显示,思政课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面对专业不同、个性鲜明、认知水平参差、兴趣点迥异的一个个学生,宏大的理论、深邃的思想不易与其专业特色、知识基础、认知风格相宜,难以有效转化为个体可感知、能理解、易共鸣的具体认知。

加之教学节奏的同步化,较难根据学生个体的理解速度进行自适应调整,会出现一部分学生“跟不上”、另一部分学生“吃不饱”的情况。此外,教师对学生思想动态、知识掌握与价值内化程度的评估主要依赖阶段性考试课后作业,缺乏实时、持续、伴随式的洞察和及时调整。

二是少与多的矛盾,有限的教育资源与多样场需求存在矛盾。

大思政课强调社会大课堂,但将广阔的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可及、可

感、可用的教学资源,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优质的思政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名校、名师手中,难以普惠共享,也缺乏系统性的数字化整合与教学化设计。

加之红色场馆、实践基地、行业案例等优质资源遍布全国各处,客观上存在时空限制;组织大规模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多面临成本、安全、教学计划协调等多重条件约束;场景体验扁平化,即使能够抵达现场,对历史事件、宏大叙事的内在逻辑与情感冲击,也往往难以实现深度沉浸与共鸣,难以实现课程内容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三是单独与系统的矛盾,师资个人的“单打独斗”与育人任务的“系统

提升”之间的矛盾。

思政教师个人与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社会导师之间存在协同育人壁垒,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系统性合力。同时,教学方法需要突破“我讲你听”的传统模式,互动性、沉浸感和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创新需要引入新的工具与模式。

四是点与面的矛盾,大思政课建设成效需要及时全面的综合评价。传统的评价维度比较单一,“重知识轻素养”,对学生理论认知、价值认同、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的考核手段有限,难以更全面反映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法治素养的复杂、内隐、长期性变化,难以精准衡量学生

思想观念的真正内化与素养能力的全面提升。

加之“重结果轻过程”的单一维度,缺乏对学习过程中互动、思考、转变、践行关键节点的记录与系统性综合分析,过程性评价不足,且“重个体轻生态”,对课程本身、教学共同体乃至育人生态的整体效能评估缺乏综合数据支撑。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内生逻辑——

运行机制耦合:数据驱动与价值传递的统一。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深刻的理论契合与时代必然。从运行机制看,传统的思政教育依赖教师的经验积累和直观判断,会存在低效、针对性不强

单的资源叠加,而是基于数据流和价值链的有机转化创新。

纵向上,人工智能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有效衔接、一体化、系统化。通过学习内容及路径分析,识别各阶段思政教育的内容断层和重叠,从而修正教学方案,实现动态的螺旋上升。小学的启蒙、中学的探究性训练、大学的思辨性研习,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可构建连贯的成长阶梯,避免割裂的碎片化培育,真正达成系统化育人、综合性育人。

时代发展必然:智能革命与教育变革的交汇。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教育的深刻变革:农业时代的口耳相传、工业时代的班级化授课、信息时代的网络教学,无不打上技术变革的深刻烙

社会现场,实现沉浸交互及情境教学。大语言模型还可创建一些特定的虚拟历史人物或时代楷模,让学生实现穿越时空的“面对面”对话。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还可构建虚拟空间及场景,模拟“乡村振兴决策模型”“重大工程现场”“国际关系博弈沙盘”等复杂情境,进而让学生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在应对虚拟挑战中深刻理解国家战略的复杂性与必要性,提升综合素养。

这些人机共生、虚实融合的教学场景,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交互的体验,破解思政“理论悬空”难题,显著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和成效。重构“师一机一生”三元协同的新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

性”存在矛盾。

思政教师个人与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社会导师之间存在协同育人壁垒,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系统性合力。同时,教学方法需要突破“我讲你听”的传统模式,互动性、沉浸感和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创新需要引入新的工具与模式。

四是点与面的矛盾,大思政课建设成效需要及时全面的综合评价。

传统的评价维度比较单一,“重知识轻素养”,对学生理论认知、价值认同、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的考核手段有限,难以更全面反映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法治素养的复杂、内隐、长期性变化,难以精准衡量学生

的困境;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及挖掘等技术,可以多维度地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认知特点和成长需求,有助于突破传统的低效教育逻辑,高效实现“一人一案”的转变。

形态结构耦合:智能系统与育人系统的同构增强。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其系统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结构特征与思政教育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系统要求存在结构同构。

横向上,人工智能推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资源的整合。借助智慧教育平台可整合优质思政教育资源,社会实践基地的红色资源可通过智能技术转化为虚拟仿真教学模块。这种整合不是简

印。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也必然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新形态。

更重要的是,智能技术本身蕴含着价值负载和意识形态属性。算法设计者的价值倾向、训练数据的选择偏见、应用场景的思想预设等,都会影响智能系统的输出结果。由此,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不仅是技术应用问题,也是意识形态战略问题。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应用模式——

拓展“沉浸交互”教学场景的时空维度。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能够跨越物理时空限制,搭建“穿越时空”的大思政实践课堂,逼真再现历史场景、未来图景及

型教学共同体。借助于智能助教、智慧伴学、自主学习等平台应用,创构“师一机一生”三元协同的新型教学共同体,让大思政课以“师”为引、以“机”为翼,拓展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监督及学习成效。

人工智能打造的数字思政教育助理,可根据教师给出的关键词、主题句或观点,从党史文献、政策文件、学术论文、教材著作、社会热点及新

闻报道中,快速梳理出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案例、图解理论、视频脚本、知识图谱等,构建融图文本、图像、音视频的思政资源库,有力提升备课效率和适配度。

守“价值引领、技术向善”的智能思政教育伦理。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数据幻象、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可能引发思维局限、推理缺失、认知失衡等。要确保AI算法模型和设计内容科学服务于提升学生的理论理解、价值辨析、信念内化和实践能力,以防止可能引发的错误思潮传播、理论表述失真、价值观念偏差,避免妨害课程内容真实性与科学性的人工智能“幻觉”风险。

一方面,强化教师的鉴别引领作用。学校和教师应对AI生成的教学设计、案例、内容表述等进行专业性、政治性和价值性的实质性审核、校正与升华,确保服务于思政教育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三重目标。要注重思想性、批判性思考,教会学生辨别信息真伪、理解算法局限的能力,避免“娱乐化”和“泛技术化”。

另一方面,强化透明、公开、可靠、可控、安全的技术底线和伦理。坚持技术善治与育人初心相统一,警惕算法偏见与歧视、注重数据隐私与安全,保障个体隐私与数据安全。

总之,要用好人工智能,推动大思政课建设迈向智能化、精准化、人本化的新阶段,让大思政课更加“活”起来、“动”起来、“潮”起来,使之成为一门有深度、有力度且更有温度的人生必修课。要以价值理性引领技术理性,让人工智能这个“变量”转化为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的“增量”,将大思政课建好、建活、建强。

(作者为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